

烈士和父亲这两个难以联系在一起的身份之间,间隔了60年。

3月28日,完成中韩交接仪式的437具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,运送至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

对很多志愿军烈士后代来说,父亲是一个陌生的概念,他们悄无声息地走了,然后埋葬在异乡的土地上。很多后代的这一生,并未享受过父爱,但仍愿意用尽一生的时间,去追寻父亲并不太长的生命里的旧日时光,寻找、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烈士父亲的形象和故事。而更多年轻的烈士,还未能有过自己的孩子,便无法归来。

在遗骸进入陵园的一刻,儿子和父亲相遇了。



一位志愿军烈士后人胸前挂着父亲遗像,手持菊花敬候父辈遗骸归来。

寻找“陌生的父亲”

那些被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粘连的未曾相见过的父与子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

无论父辈遗骸在哪,都一直惦记这一天

3月28日凌晨3点,66岁的邓其平失眠了。几个小时后,他就要去迎接从韩国回家的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。

邓其平住的沈阳市陵园街与银山路交汇处的这家宾馆800米外,就是全国最大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

邓其平索性爬了起来,为了不打搅一旁的妻子,老邓没有开灯,思绪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开始蔓延。

邓其平的父亲名叫邓仕均,在他眼里,邓仕均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不仅因为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牺牲。“我父亲的事迹被报道过多次,从中央电视台到老家的地方报纸。”邓其平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竖起了大拇指。

2013年,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,韩国总统朴槿惠首次访华,给邓其平、康明这样的志愿军烈士后人带来了一个振奋的消息:位于韩国坡州墓地中的中国志愿军军人遗骸将送还中方。

“韩国方面已经没有政治阻力了。”当时,身为“志愿军后代寻先烈墓园”QQ群发起人的康明与网友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,前往坡州墓地祭扫一事被提上日程,“马上签证、组团,去韩国。”康明说,这是纯民间的活动,就是为了寻找父辈的踪迹。

当年7月29日,这个名为“朝鲜战争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”的特殊“旅行团”抵达韩国,康明、苗务才、韩晓燕是组织者,除了热心人张伟和李进,其他人都是志愿军烈士后代。

邓其平因为家里有事抽不出时间,错失了这次机会,他只有不断地往韩国打电话:“康明,找到烈士墓地了么?”“老苗,你们怎么祭拜的?”“晓燕,墓地的墓碑上都刻了么?”

康明来自青海西宁,烈士康致中之子;苗务才来自河南济源,烈士苗维忠之子;李海放来自上海,烈士李树人之女;韩晓燕来自山西太原,烈士韩启明的侄女。

在这处位于“三八线”以南、韩国京畿道坡州市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墓园里,第2墓区整齐埋葬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。

“这里的坟墓都面朝北方,是咱中国故乡的方向。”康明说,墓地由韩国政府统一管理,所有坟墓都没有名字,只刻有遗骸被发现的位置。

一个单葬墓的墓碑引起了韩晓燕的注意,遗骸发现的地方就是韩晓燕二伯父韩启明牺牲地附近。韩晓燕眼睛瞬间变得湿润,虽然不能确定这座墓里长眠的就是她的二伯。

拿出家乡酒,再摆上糕点,前来祭拜的烈士后人都在墓地前跪拜、痛哭。“祭拜过后,大家都许下了一个心愿:等烈士遗骸回国前,一定来韩国迎接。”康明在电话里这样对邓其平说,邓其平老泪纵横。

综合各方信息,康明等人觉得,韩国方面送还志愿军烈士遗骸可能会在2014年的清明节,送还的“提前”到来,让他们有一些“措手不及”。

时间太赶,他们来不及去办理签证,于是临时决定“去沈阳迎接”。

来沈阳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,是邓其平这辈子都不会错过的、最重要

的事情。“我父亲极有可能就在这批回家的烈士中。”老邓有自己的分析,他的父亲邓仕均是在韩国洪川江南岸一带牺牲并临时埋葬的,而这一批的发掘工作恰好也包含了该地。

仍未有睡意的邓其平发现,窗外已泛起初春清晨的白光,“又是一个未眠夜。”

为了迎接“父亲”归来,邓其平觉得自己得好好收拾一下。面对镜子里那个头发稀疏、双鬓斑白的老人,邓其平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父辈的英灵从国外回来,“不管里面有没有父亲,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说出自己的心里话,无论父辈的遗骸在哪里,我们一直都惦记这一天。”

苦寻50年,只为看清父亲模样

66岁的苗务才直到5岁才知道自己是有父亲的,但他这辈子,从没见过自己父亲的面。

1953年,父亲苗维忠在朝鲜战场上牺牲,部队将苗维忠的奖章和日用物品寄回老家,里面有父亲的一张照片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父亲的样子。”尽管只有一张照片,苗务才有空就从柜子里拿出来看看父亲的样子,“很幸福,很温暖。”
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,苗务才开始在全国四处搜寻父亲的战友,尽可能了解父亲生前的一切情况。他了解一个活生生的父亲。

1965年开始,他写信给父亲生前的部队查询父亲牺牲的详细情况。直到1983年,焕发革命烈士证书后,他从烈士证书的说明上看到,父亲牺牲后葬在

朝鲜江原道金化郡地井地区。几十年来,他跑北京、跑太原、跑合肥、跑乌鲁木齐,派儿子跑成都,到处找180师父亲的老战友。

苗维忠生前的战友郎东方写了《战友苗维忠同志生前几点战斗回忆》。在这个回忆录中,苗务才得知了父亲更为详细的故事:苗维忠1944年入伍,1949年入党,1953年2月9日在朝鲜鱼隐山战斗中牺牲,年仅29岁。生前立过一等功三次、三等功两次。

这位安葬于朝鲜的烈士,赴朝前是180师540团侦察兵,解放太原后南下解放陕西、解放大西南,然后赴朝作战。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五次战役中,180师为掩护友军撤退受到重创,苗维忠成为少数突围成功的士兵。

来沈阳前,康明就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苗务才寻找父亲的故事,“一个农村出生、一辈子干农活的老汉,整理出来的材料都可以出书了。”

其他的志愿军烈士后代喜欢喊苗务才“苗老汉”,因为苗务才的口音里透着中原的粗犷与朴实,他常说:“我就是农村的,不遗余力地找父亲就是要给父亲披麻戴孝,让父亲知道,儿子一直记着他。有一天能够去父亲的坟上抓一把土回来,给自己以及去世的家人一个交代。”

不亲眼看到这些志愿军烈士后代手里的一堆堆材料,就很难了解到他们寻找父亲背后有过怎样的辛酸和艰难。就像康明说的那样,“他们什么时候入朝作战,打仗时如何英勇,到底是怎么牺牲的……我们之所以能如此了解自己的父亲,是因为这些都是每个人用嘴巴问、用脚跑、用手扒拉出来的故事。”

(下转B02版)